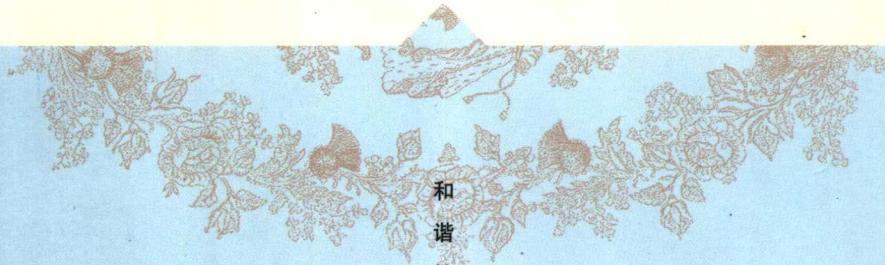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构建和谐社会：多维视角下的理论思索



和谐社会
建设
理论
研讨
丛书

GOUJIAN
HEXIESHEHUI:
DUOWEISHIJIAO
XIA DE
LILUNSI SUO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构建和谐社会：多维视角下的理论思索

和
谐
社
会
建
设
理
论
研
讨
丛
书

GOUJIAN
HEXIESHEHUI:
DUOWEISHIJIAO
XIA DE
LILUNSI SUO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构建和谐社会:多维视角下的理论思索/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丛书)

ISBN 7-208-06598-5

I. 构... II. 中...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393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丛书 ·

构建和谐社会:多维视角下的理论思索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211,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598-5/D·1148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论“和谐”思想的哲学与实践内涵·····	杨 悦	1
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现代化改造 ·····	邵强进	12
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准备		
——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和諧 ·····	贡华南	32
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共生型城市改造模式的思考 ·····	王 郁	50
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分析 ·····	李志青	70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建设和谐社会 ·····	任 远	86
和谐社会与就业促进 ·····	刘社建	98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李安方	112
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	胡 键	131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王玉玮	144
和谐社会构建中上海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研究·····	胡 彬	158
和谐社会与上海软实力的构建·····	朱新光	174
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程 彤	186
当前文学问题的理论思考·····	周兴陆	199
文学的建构:现代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 ·····	文贵良	211
西方社会学家关于“和谐社会”的观点及其启示·····	蒋逸民	225
后记·····		242

论“和谐”思想的哲学与实践内涵

杨 悦

一、“和谐”的辩证内涵

(一)“和谐”的价值内涵

古今中外,人类的理想社会状态就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和谐;西方世界的宗教学说,“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式”的宇宙观,甚至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和谐。这是一种理想境界,体现着人类所处各种关系的协调、平等和基于良性循环的社会发展机制与状态。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概念,最早是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提出来的。他给人类描绘了这样一种制度图景:在未来社会中,人们的三大类十二种欲望将形成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这是一种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的欲望。在这种欲望满足之中,社会形成一种和谐制度,它使妇女彻底解放,使个人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相一致,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情欲与爱好之中,这是一种无比诱人的社会图景。与之相应,法国思想家巴斯夏写成了《和谐经济论》一书,成为影响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巨著,在和谐社会思想影响下,欧洲社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初步发展后,逐渐走向了体现人文主义关怀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福利主义、快乐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今日欧洲发展的基本主题。

通常,人们对“和谐”的认识带有一种价值取向,认为和谐就是理想中的世界图景。固然,美好的理想并没有错,但严格地说,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作为价值而存在的和谐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更多体

现着人们对现实的向往和追求。但另一方面,这种向往也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它的现实依据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脱离了客观的社会存在基础,美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无数的历史证明了,忽略了对现实条件的认识与把握,就可能带来盲目行动,甚至造成社会灾难。

其实,“任何方面和层次上的社会认识活动所面对的客体,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观念性存在,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物质性存在,而是观念化了的社会现实和现实化的社会观念”。这是马克思曾说过的话。所以,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和谐图景,其现实基础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追求和谐,就必须了解社会中存在哪些和谐因素,哪些不和谐因素,然后针对不和谐因素进行调整,进而达到和谐的目标。

(二)“和谐”的事实基础——差异

许多人理解的“和谐”,就是没有矛盾,人人一团和气,事事一片大好。但实际上,和谐指的并不仅是“同”,而更重要的是不同,也就是辩证的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古希腊哲学家们也揭示了和谐的辩证内涵。赫拉克利特认为,对立产生和谐,相反者相成,并进一步指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见的和谐更好。”也就是说,通过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就产生了矛盾的各种因素或者说各方力量的均衡,从而诞生了统一而又稳定的和谐。这是建立在朴素辩证法基础上的和谐。

黑格尔后来又从辩证运动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和谐的涵义,他认为:“简单的东西、一种音调的重复并不是和谐。差别是属于和谐的;它必须在本质上、绝对的意义上是一种差别。和谐正是绝对的变或变化——不是变成他物,现在是这个,然后变成别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每一不同的、特殊的東西之与他物不同——不是抽象的与任何他物不同,而是与它的对方不同:它们每个只在它的对方本身被包含在它的概念中时才是存在的。变化是统一,是两个东西联系于一,是一个有,是这物和他物。在和谐中或在思想中我们承认是如此的;我们看到、思维到这个变化——本质上的统一。”

所以,和谐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简单的同一,而是去寻求矛盾转化、协调、同一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

谐”的辩证内涵:

首先,和谐具有客观性。和谐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存在。和谐指的是各种复杂而变化的社会要素的辩证统一,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这些复杂的要素,才有了各种矛盾,于是才有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与和谐正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和谐不是空洞的,脱离现实的,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乌托邦”,它必须是立于客观现实基础上的。这也要求人们在追求和谐的时候,要避免“乌托邦”式的和谐,要对客观存在的矛盾有充分的认识,让人的思想和行动合乎世界本来面目。

其次,和谐具有历史性。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和谐的追求是不具有历史性的,或将社会和谐最终归结于老天、上帝,或将和谐归结于人类自身无限的改造能力。马克思的理论就是针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和谐观提出的,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用,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同样,我们今天在认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时,不能忽视了唯物史观。

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这时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的“给予”,基本上“靠天吃饭”,因此人类具有先天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宇宙万物自始就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和完美统一的和谐整体。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但由于低下的生产力,人的需要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这时,就可能出现战争、暴乱等不和谐现象,所以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就没有得到协调发展。到了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发生了对立,自然成为人的改造对象,人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时和谐的内涵发生了改变。社会和谐的基础不再是“老天”对人的赐予,而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的能力,这时,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自己的改造活动,就可以实现世界的和谐。但事实上,虽然人类的改造活动带来了物质的丰裕,但同时却产生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不和谐问题,诸如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人的心理问题、文化异化等,这些都是工业社会产生的新矛盾。

所以,只有看到和谐的历史性,才能针对性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

矛盾,确立适当的和谐目标,进而才能采取正确的改造行动。

第三,和谐应当符合普遍的价值理念。如今已经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的发展和活动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和谐必须置于世界一体化的大环境中来考察。20世纪以来,一些民族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发展不断地向外扩张,疯狂的扩张导致了极权主义,导致了整个世界处于风险状态,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这就构成了对和谐生活的威胁。现当代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后,也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对共同交往问题的研究。雅斯贝尔斯、涂尔干、巴赫金、哈贝马斯等哲学家都试图通过建立理想的生存共同体来为人类提供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达到疗治西方文明病症的目的。共同的交往需要共同的准则,也就是“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1993年8月28日—9月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代表们在大会上讨论、通过并签署了经过反复修改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界定了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内涵:“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只有遵守了共同的准则,人类才能共同生活,享受共同的利益,才能达到和谐。

第四,和谐必须重视本土文化。和谐既然是相对于现实社会矛盾而言的,那么要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就不能不考虑本土文化对人们活动的影响。吉登斯说:“全球化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相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心

理上都具有根深蒂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改革与转型的巨大困难,一方面源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因此,对于中国的和谐建设来说,协调不同地域文化间,特别是中西方文化间的适应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否则,和谐也是难以达到的。中国近百年的革命与改革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从 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引入“德赛”二先生,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倡导的“全盘西化论”,都试图把某一现成制度或文化照搬照套到中国社会实践中来,事实证明,由于没有考虑到中国本土状况或文化传统,结果都导致了不和谐的结局。中国的改革实践就是融合过程,这一过程要达到和谐,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改革创新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如果忽略这一重要因素,就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

二、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追求“和谐”其实就是对社会矛盾途径的探求与解决,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社会矛盾永远存在,那么和谐是不是就永远达不到了呢?事实上,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解决和谐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树立了如何美好的理想,而在于我们如何在现实中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和谐因素,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到相对和谐的状态。

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大体可以从以下几大方面来考察:

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初表现为生产力的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部分。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人靠天吃饭,依附于自然,这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可是,当全世界以巨大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进入 21 世纪之际,就出现了以下的变化:土地资源减少,森林草场破坏严重,淡水资源紧缺,能耗骤增等等。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严重,除了空气污染、水质污染、食物污染、核污染,还

有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等。在中国,每年有3 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化,沙化总面积达260万平方公里。水系方面,全国有63%的河段失去饮用水功能。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污染严重,水和石油资源日益匮乏。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打破将直接影响到人类未来的生存。为此,1992年6月联合国在“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提出了“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的口号。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升华为一种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予鼓励,对环境不利的经济活动应予摒弃。在发展指标上,不单纯用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20世纪末期解决人与自然尖锐矛盾的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其实这里要解决的就是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衡、不协调的不和谐现象。具体表现在几大方面:

第一,地区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的发展不平衡。1997—2002年,80%的外商投资于东部地区,80%的大学生毕业后到东部地区工作,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的65%在东部地区。

第二,城乡之间的不平衡。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2003年扩大到3.23:1,“三农”问题仍很严重,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县乡财政紧张,向农民收费项目多。

第三,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拉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

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我国 1988 年的基尼系数为 0.34, 1995 年为 0.39, 2003 年为 0.45, 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0.4 的收入差距警戒线。

第四,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过于追求 GDP 数字, 相对忽视了关系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社会发展的其他综合因素, 其中包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道德水平、民族文化建设等影响中国和中国人民整体发展的一些因素。

第五, 政府职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在计划经济的年代, 政府像家长, 什么都管。可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 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撒手, 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去管。可是在这一过程中, 一些政府职能发生了混乱, 该管的不管, 如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等方面, 不该管的却管的很死, 如在许多应当由市场决定的利益方面。这其实是政府职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有些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 有些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 如政府职能转换不力、城乡差别严重等问题,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也要区别对待, 有的放矢地进行调整。

三是人与自身的不和谐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 一些人异化了, 社会文化也异化了。这是西方学者, 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 使得商品交换成为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原则, 一切社会关系,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物化”了, 于是, 人也逐渐失去了主体性, 主体觉得不是依靠自己, 而是依赖于自己以外的力量, 而这种外部力量正是自己的行动与结果产生的, 于是, 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自己行动的主宰, 而是相反为自己的行动所主宰、支配, 他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 人性异化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的现象, 而在现代社会中, 人性的异化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它几乎无孔不入,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以

克服孤独感的愿望时,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尽管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了深重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内疚感。总之,异化这个概念触及了现代人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的危机。马尔库塞也认为,丰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它却是与巨大的精神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承受着“多余压抑”所带来的额外的紧张和负担。这种多余的压抑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一系列的不和谐已经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哈贝马斯认为,人类进入现代性社会时,不能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奋斗目标,要从根本上摧毁把获取最大的效率和产量作为奋斗目标的工业社会意识,要反对过度消费和异化消费,要控制科技发展速度,缩小生产规模。社会发展体现为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意蕴是对人的普遍关怀,而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意蕴则是人格价值重塑。

三、追求和谐不可忽视成本问题

如前所述,和谐只是一种终极追求,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某种终极的状态,它只是一个根据社会不同矛盾而进行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无法界定什么状态是和谐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地减少不和谐的发生,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试错和进化法则。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那么我们如何来调整并控制不和谐行为呢?这里需要有一种成本意识。人们在实践和谐目标的过程中,通常是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地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在进行的过程中却发现,在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结果导致过程与目标发生偏离,甚至失败。例如在社会改革实践过程中,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两条不同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当时的改革由于目标过于明确、手段

过于激进,产生了经济大幅下滑、恶性通货膨胀,政府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相对来说,社会转轨过程比较平稳,代价较低。转轨经济学家科尔奈早在体制转轨的研究中就提出了“体制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一个经济体系中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兼容和相互协调,是一个稳定的体系性的重要保证,也是这个体制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各体制之间相互不协调,就会出现混乱,从而破坏效率,使经济增长率下降。我们将这种由“体制间不协调”所引起的无效率,称为“混乱的效率损失”,或称为“不协调成本”。因此,对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来说,要达到和谐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协调各项变革因素,使得转轨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及产生的社会振荡降到最低。因此,在实践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由成本导向来控制社会实践行为的效率或协调与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方法。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花费巨资打造新北京、新奥运和上海世博会等,这一方法包含着一系列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借鉴已有的(包括本国及别国)发展经验和教训,从而将和谐的目标进行分解,确定一系列指标体系,与之对照,最终进行调控。如今在国际上已经有一系列的指标来评价社会发展的情况,包括:

(1) 社会组织分类指数,其中包括慈善机构、基金会数目(+)及非营利部门职工人数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2) 失业与就业分类指数,其中包括失业率(-),城镇新就业人数(+),全国从业人员年末人数(+);

(3) 消费指数,其中包括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零售物价总指数(-);

(4) 生活质量指数,包括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5) 文化发展指数,包括被评定为文化遗迹的建筑物及遗址数目(+),制作电影的数目(+),出版书刊数目(+);

(6) 体育分类指数,包括公共体育设施数目(+),公共体育设施的平均使用率(+),主要体育盛事代表团人数(+);

(7) 教育分类指数,包括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8) 卫生健康分类指数,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出生婴儿的死亡率(-)及传染病死亡率(-),自杀人数(每十万人人口)(-)。

这里,正(+)及负(-)号是用来表示每一指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例如,在“慈善机构、基金会数目”这个指标的正号,即表示数目愈高,理论上在公民社会力量这个领域的发展方面则愈进步,对整体的社会发展也有正面的效果。

通过这些指标体系,可以在实践过程中,对各方面状况进行有效地监控,从而不断地降低成本、降低风险,实实在在地向和谐的目标迈进。

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社会控制机制完善的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法治秩序的社会。法治社会最主要的任务,是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进行约束。现在有那么多的社会不和谐,也与权力没有得到有力约束有关。有些人利用公共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还表现在对为了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越轨行为、违法行为能够有效地、及时地制约和打击,对诸多反社会的力量能够有效控制。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都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调节与解决。没有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社会是没有的。关键是当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出来之后,执政者(各级领导)能不能运用制度、规范、机构的力量进行调解,将其纯化、缓和,不使其激化。“和谐社会”要求用法治、制度等手段解决社会不和谐的问题。

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谐社会”应是能够及时发现不和谐因素的社会。要通过落实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以及依靠群众等,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并要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某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他们对人民的疾苦不闻不问,为了政绩往往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无原则地筛选了大

量有关人民疾苦的真实信息。导致原本性质并不严重的问题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上升为具有冲突性质的问题。社会管理体制中由于缺少预警的机构和对策,不能很好地应对突发事件,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损失。迫切要求我们构建全新的预警机制,在机构、人员、财力方面得到保证,以便对社会中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及时反映。让决策层能够真正地掌握社会中不稳定的相关信息,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在社会张力到达爆发前提出预警,给相关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对策。社会预警机制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指利益方面的冲突的预警,也应有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社会问题、政治危机方面的内容。

参考文献:

- ①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 ④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博士)

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现代化改造

邵强进

和谐是一种思维方法,在东西方哲学传统中,均存在对“和谐”的描述或规定,但两者在主旨与方法上亦存在不少差异。先秦贤哲的和谐思想融入到中国传统思维之中,形成了内涵化与模糊化、整体化与非形式化、伦理化与弱法治化等基本特点。相应于这些基本特点,面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多方位、立体化的现代化改造。

一、和谐思维与和谐社会

相应于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先秦思想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核。考察先秦与古希腊时期的和谐思维与和谐社会构想,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传统思维方法的差异、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一) 中国先秦时期的和谐思想

“和”是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的基本观念之一。和谐社会的构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系统。从构词法上看,“和”为形声字,读音从“禾”。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并无“和”字,“和”由“𪛗”演变而来,而“𪛗”则是“龠”的化简。“龠”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其左边上半部表示一种吹笙之类的乐器,左边下半部是“册”字的笔画,表示书籍,合在一起意为奏乐读书,后简化为“口”;“龠”字右边为“禾”,“禾,嘉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说文

解字》)。“禾”^[1]字在古代指“粟”、“粱”，是当时一种主要食物，后被引申为禾苗、庄稼；“𥝌”字的意境即“一个人在庄稼旁奏乐、读书”，这也是当时中国农耕社会中人们所向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理想图景。

谐，“詒也，从言皆声”(《说文解字》)，主要指和合、协调，如“八音克谐，无与夺伦”(《书·舜典》)“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公十一年》)等等。《广韵》释曰：“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再如，“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兵法第十七》)。古人将“和”与“谐”组合成“和谐”一词，意指协调，如“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晋书·挚虞传》)，后引申指行动连贯一致，如“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后汉书·仲长统傅昌言法诫》)。

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和合”是先秦各家各派的普遍思想观念，诸位贤哲亦从不同的角度对“和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先秦思想的代表，《易经》的基本思想是阴阳和合，阴阳的矛盾造就了世界万物的多样化，但其最终目标是达成和谐、协调与统一。如《周易》乾卦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强调万物应适应天道变化而运行，保持和谐的生存状态。又如《国语·郑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里“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味着有差别的统一。

儒家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他人的和谐。《论语》中“和”字共出现8次，其中有4次意为“和谐、恰当、恰到好处”。如《论语·学而》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儒家后学得到发扬，如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荀子·天论》)；董仲舒强调“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等等。

墨家墨子强调从实际出发，并针对孔子“仁爱”说而提出“兼爱”论，强调“爱无差等”的基本理念，即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的普

[1] 历代注家都把“禾”解释为“中和”或“当作和”。